

上下求索九十年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探索历程

潘世伟 主编

学林出版社

上下求索九十年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探索历程

潘世伟 主编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下求索九十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探索历程/潘世伟主编;上海社科院邓中心撰稿.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6

ISBN 978-7-5486-0179-1

I. ①上… II. ①潘…②上…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②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231②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1318 号

上下求索九十年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探索历程



主 编——潘世伟

撰 稿——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李西曦 胡小波

封面设计——周剑锋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20 1/16

印 张——13.5

字 数——20 万

版 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600 册

书 号——ISBN 978-7-5486-0179-1/D·8

定 价——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言

潘世伟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马克思主义的“三化”——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虽然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第一次明确而集中地提出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历来就是党在思想理论领域的核心工作。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总结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宝贵经验,而总结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宝贵经验,又要求我们系统回顾我们党是如何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时代发展过程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内容与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相结合的。

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建设。就党的诞生而言,思想理论准备是建党准备的核心工作。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的关键,马克思主义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所掌握,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成立的关键。在建党前夕,无论是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大学教授,还是毛泽东、蔡和森这样的知识青年,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党的性质而言,思想理论工作是确保其先进性质的根本前提。无论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领导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领导建设,以工人农民为主要成员的中国共产党,都必须依靠思想理论来确保领导作用的先进,提高领导工作的成效。就党的历史而言,思想

理论方面的拨乱反正是最重要的拨乱反正。党的九十年历史是党的领袖和党的理论工作者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的历史,其间既有丰硕成果,也有深刻教训。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党在实际工作中的重大挫折往往与党在思想理论中的重大偏差有密切联系,而党在思想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也往往是实际工作的重大突破的必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核心任务。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吸引中国先进分子,是因为它是社会领域的科学理论,就像热力学定律和生物进化论是自然领域的科学理论一样。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列宁发展的科学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理论基础,意味着党的理论工作至少有三方面的任务。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的普遍真理,必须把它与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人口众多、资源分布不均、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的国家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创立于19世纪中后期的经典学说,必须把它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以及中国和世界之间关系的变化结合起来。第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卷帙浩繁、学理深刻的科学理论,必须把它与全国各族人民、各地群众和各阶层人士便于理解、乐于接受的表达形式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理论工作的基本任务,这可以说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充分发扬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认真总结中国人民的实践经验,这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同时,我们还要努力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及时回答和应对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这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意思;我们也要虚心倾听群众呼声,谨慎调整思想理论的传播方式,这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思。

在党的九十年历史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几代领导集

体和理论工作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方面作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努力和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进行认真总结,更值得我们格外珍惜、继承发扬。当今世界形势复杂,迫切需要用科学理论分析认识;当今中国任务艰巨,迫切需要科学理论进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对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来说,这意味着我们有了无比丰富的研究材料,也有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就要求我们在思想上理论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明确肩负使命,为履行这种使命下决心做出更加切实的努力,是思想理论工作者对建党九十周年的最好纪念。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过程中也占据特殊地位。在建党的理论准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青年》杂志,1915年在上海创刊(当时刊名为《青年杂志》),1917年迁到北京,几年后又于1920年亦即建党前夕搬到上海编印,发表了大量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是在上海完成翻译并出版发行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解放前夕,上海汇集了李达、艾思奇、王亚南、郭大力等大量党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1936年出版的艾思奇著《大众哲学》(最初以《哲学讲话》为题于1934年至1935年在《读书生活》连载),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典范例。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的理论工作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一个例子,是1957年出版的时任华东师大政教系教授的冯契撰写的《怎样认识世界》一书。在毛泽东于1960年写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本书,并请秘书“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一位当时收到此书的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多年后回忆说,她得到的那本书是毛泽东自己

读过的，在这本书上毛泽东留下了多处批注、眉批和旁批，在很多地方画了圈圈，予以肯定。

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推荐《怎样认识世界》一书的时候，作者冯契教授还兼任着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九十年上下求索过程中，上海社科院的许多同志曾亲身参与。如首任院党委书记李培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参加工作，曾长期担任党校教员和领导工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曾担任我院经济所首任所长的沈志远，20世纪30年代就在上海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著述，并翻译出版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书。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社科院许多科研人员以专业知识和学术专长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1993年，上海社科院在全国首家创设“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后改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标志着我院科研人员参与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时候，我院邓中心的科研人员对九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过程进行了力求简明而系统、生动而准确的梳理，本书就是这种梳理的一个结果。

离上海社科院总部不远处，有一条叫“渔阳里”的弄堂，它曾经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场所。我们希望，这本小书能多多少少显示，曾经从这条小弄堂里传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火，九十年后正熊熊燃烧。

2011年6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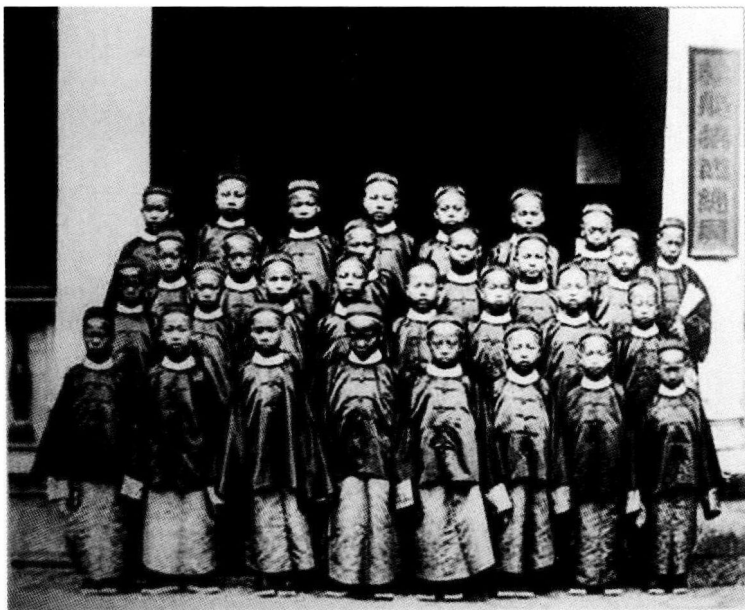
序言	1
第一部分 根深叶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5
(一) 思想和学术的理解与阐释	5
(二) 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15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含义	19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23
(三) 新中国前三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	28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42
(一)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	43
(二)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47
(三)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52
(四)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55
第二部分 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60
一、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特点和内容	60
(一) 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革命时代的认识 and 思想转变	60
(二) 结合革命实践,凸显马克思主义时代特征	63
二、1949 年至 1976 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特点、经验和教训	78
(一) 阶段性目标的误判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偏差	78
(二) 曲折中前进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成果	89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成果	93
(一)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突破	94

(二) 世界社会主义新形势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进展	109
(三) 重要战略机遇期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116
第三部分 春风化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124
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准备和载体建设	124
(一) 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开端之争	125
(二) 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实践	128
(三) “少年中国学会”:最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团	130
(四) “新民学会”: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团	134
二、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举措和效应	140
(一) 谁更靠近马克思——毛泽东与王明的交锋	140
(二) 延安整风缘起	142
(三)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干部的举措	145
(四) 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	149
(五) 《论持久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	152
(六) “三三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结晶	154
三、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做法	161
(一) 掌握媒体、出版毛选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161
(二) “工农兵学哲学”	164
(三)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169
(四) 学习雷锋好榜样	173
四、改革开放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79
(一) 真理标准大讨论	180
(二) 学习、宣传邓小平理论	186
(三) 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90
(四) 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	196
参考文献	203
编后说明	205

根深叶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约 5 000 年前，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相继生发；

约 2 500 年前，儒家与名、墨、道、法等诸子百家筚路蓝缕，共启中国文化之山林；



李鸿章等试图以派遣留学生的方式，计划以 15 年时间系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挽救清王朝行将覆亡的颓势。图为留美幼童合影



1906年,新军河南彰德秋操时,外国军官在品评中国军官的新型欧式军礼服

100年前,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大清王朝轰然倒塌;

90年前,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成为近现代中国思想的主潮乃是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九十年的成果。自从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以后,经过割地求和、尤其是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中国人由蔑视、排外的心态转而被畏惧的心态所替代。所幸,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了深刻的反省,觉悟到应该向西方学习,于是有了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但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推行的洋务运动只知道坚甲利兵和声光化电的重要,完全是技艺的模仿;康有为、梁启超推进的维新运动在于变法自强,不过是政治的抄袭,这些都可以说是“中体西用”的见解。

随着清王朝的覆亡,儒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功能亦宣告终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乃是在中国实行西方政治民主的实验。孙中山接受西方政治民主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观点,提出民族、民主、民生的三民主义,启迪民族意识的觉醒,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不幸的是,辛亥革命的双重遗产仿佛注定了20世纪中国步入现代化之路的艰难与坎坷。于是,乃有20世纪初中国的一代知识精英的根本觉悟,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到了五四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思想领袖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李大钊说: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大有风靡世界的势



“中体西用”思想对洋务派运动以及晚清立宪等均有重大影响。图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

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所以,李大钊等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引领 20 世纪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主流思想、中国近现代学术与文化的主潮,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其中国革命的实践,不断学习、探索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则因为专业学者以各种形式参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探讨。中国共产党内外、专业学术领域内外所进行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的相关性讨论,彼此激发,相得益彰,合力谱成中国现当代史的壮丽篇章。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同时,关注中国共产党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专业学术研究的历史,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体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智慧、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本土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近代以降,曾经长期占据中国学术主流的传统儒家思想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儒学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暴以后,成为了博物馆的陈列品,它在思想文化学术等方面所占的统治地位,已经成为历史的烟云。100 多年来,近 20 余种学术思潮曾经光临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与智慧传统的文明大国,期望代替儒家思想成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各种学术思潮的涌动,为



实用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思想之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图为杜威在访华期间与南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合影

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新的气象,其中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了中国。作为思想先导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然而然地获得主流地位,而是在与各种思潮的争论中赢得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成为引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近代科学与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也是对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和超越的思想成果。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在迅猛发展并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文明和文化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亲自参加和领导工人革命的斗争中,以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全世界无产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入手,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状况,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提出共产主义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宣告了人类自由、解放和幸福的途径。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一被引进中国,就不仅仅被当作一般的学术思想,而是很快成为指导中国社会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就在于它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它的传播和发展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由于客观社会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在中国的传播就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学术思潮,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思潮。根据马克思主义在



伯特兰·罗素的访华为寻求出路和解决之道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带来更多新鲜养料。图为罗素在北京与讲学社同仁合影

中国的早期传播史料记载,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人就通过报纸了解到有关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而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的名字大约是在 1899 年的《万国公报》上。但是,作为学术思想或者学术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要比作为社会思潮(主要是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晚得多。作为学术思潮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与研究,要归功于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介绍、陈独秀对中国社会作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阶级分析、瞿秋白提出的“互辩律”的唯物论以及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较为全面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由西学之一种到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本部分内容将以中国现当代历史发展为主要脉络,以上述阶段为思想特征,概要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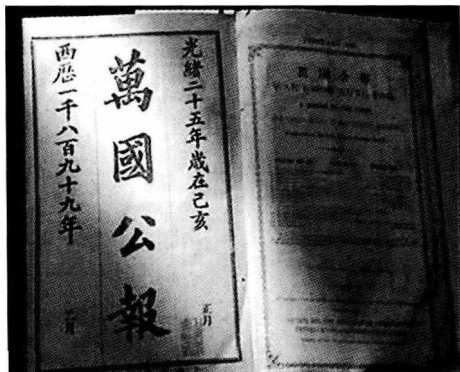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一) 思想和学术的理解与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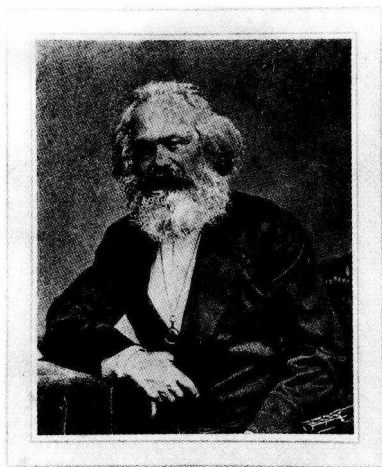
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的名字大约是在 1899 年的春天,当时在“广学会”主办的月刊《万国公报》上,公开登载了由李提摩太(T·Richard)节译、蔡尔康撰文的英国进化论者颌德所著《社会进化论》的前 3 章(译文标题《大同学》)。其中曾经多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



《大同学》一书



1899 年 2 月到 4 月,《万国公报》连续刊发了《大同学》文章,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及《共产党宣言》



斯格馬

此肖像係由日本橫濱之新民叢報所刊載，其時為一九〇七年。此肖像係由日本橫濱之新民叢報所刊載，其時為一九〇七年。

最早传入中国的马克思肖像，刊载于1907年世界社出版的《近世界六十名人》一书中。此肖像介绍将马克思的学说与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等同起来



1902年，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此刊物文章大多出自梁启超之手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报刊上开始大量出现关于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其中篇幅最多的是有关社会主义学说的翻译。梁启超可能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学者，1902 年至 1904 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多篇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文章，他写道：“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而社会主义在梁启超看来，乃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人群主义”，“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家，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今译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伏压……”在另一篇题为《中国之社会主义》中，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作为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概括其要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动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但是，梁启超又强调这种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有相通之处。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的曲解。

1903 年，著名学者马君武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比较》，指出“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氏之徒，遂谓是与达尔文言物竞之旨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义开始有影响的传播,是在孙中山及其同志所创办的《民报》上。特别是1905年11月,《民报》刊登了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在第3号上改称为《列传》),朱执信还详细地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事迹、《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要点和“十条纲领”)以及剩余价值与资本积累学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孙中山的大力提倡,社会主义一时成为最为广泛的社会思潮,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产生于19世纪的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不满意现存社会种种组织而“应时顺势”、思以改良的思想学理。孙中山十分钦佩马克思的学识,赞扬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之言论矣”。但他又强调,“中国今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将社会主义的学说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相结合,并身体力行,运用到他的治国方略中去。



梁启超曾经在百日维新中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焦点人物,他总是试图站在历史的潮头上开风气之先。图为梁启超与其子女合影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只是早期的零星传播,马克思主义真正开始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直接联系。



同为中国同盟会会员的马君武和朱执信对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4)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救国的理论开始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而作为学术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深入研究则发生在1920年后,早期的传播和研究至1927年达到高潮。尤其是唯物辩证法,一度风靡全国,其力量之大,前所未有,艾思奇在当时曾经惊呼:“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之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许许多多旧的文学者及研究家都

一天一天地‘转变’起来。人道主义者的鲁迅抛弃了人道主义,李石岑先生撇开了尼采,朱谦之先生听说也一时地成为辩证法唯物论者。任何顽固的旧学者,只要不是甘心没落,都不能不拭目一观马克思主义的典籍,任何敢于独创的敏锐的思想家也不得不向《资本论》求助。”所以,艾思奇又说:中国哲学的新时代,中国有着无限的“将来”的哲学思潮,是在1927年后掩蔽了全思想界的唯物辩证法思潮出现时才显露头角。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创始人之一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是由李大钊开始的。郭湛波先